

记忆与身份认同的文学演示*

— 1960年代韩国华人华文小说研究¹⁾

梁楠**

【目录】

1. 绪论
2. 作为文学媒介的小说
3. 韩华华文小说中记忆叙事的生产
4. 韩华华文小说中回忆性的空间描写
5. 结论：记忆、身份认同与文学的三维交互

【摘要】

记忆远远不是用人体自身能力和调节机制就可以解释的问题，而是一个与外部相关的问题，人们回忆的只是他们所交流的内容以及在集体记忆框架中占有一席之地内容。“文化记忆”的研究被越来越广泛地用于文学研究，记忆与身份认同之间的交互关系是文学在“记忆话语”研究中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选择以虚构为特征的“小说”这一文学体裁，探讨韩华在韩国文化、中国(大陆)文化与台湾文化相互交融的独特文化语境下，关注过去或当下的哪些焦点；继而又是通过怎样的叙述策略，将这些直接或间接的经历，或是想象或虚构的事件加以象征和阐释，最终使其引起韩华社会的集体回忆；这些小说作品作为集体记忆的重要表达方式，在韩华集体寻求身份认同上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关键词】记忆；集体记忆；文化记忆；文学媒介；身份认同。

* 이 논문은 동아대학교 교내연구비 지원에 의하여 연구되었습니다.

** 东亚大学中国学系助教授 (liang-nan@hanmail.net)。

1) 由于韩国华人华文文学、韩国华人华文小说等表述略显冗长，故以下将韩国华人简称为“韩华”。

1. 绪论

提到“记忆”，我们会很自然地将它理解为是一种人体内部现象。其实，记忆所储存的内容如何被组织与整理、记忆被保存时间的长短等问题，却远远不是用人体自身能力和调节机制就可以解释的问题，而是一个与外部，即与社会、文化等外部框架密切相关的问题。²⁾扬·阿斯曼认为：“虽然‘拥有’记忆的是个人，但这种记忆离不开集体的影响。虽然集体不能“拥有”记忆，但它决定了其成员的记忆，即便是最私人的回忆也只能产生于社会团体内部的交流与互动。记忆在交往中生存和延续，人们回忆的只是他们所交流的内容以及在集体记忆框架中占有一席之地内容。”³⁾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扬·阿斯曼将集体回忆的形式分为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

扬·阿斯曼所论述的文化记忆，关注的是过去中的某些焦点，文化记忆中的过去不能被依原样全盘保留，过去在这里通常是被凝结成了一些可供回忆附着的象征物。⁴⁾记忆和身份认同的关联性问题，自1980年代以来一直都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文化记忆建构和巩固了身份认同。因为文化记忆保存了形成集体独特性和差异性的知识库，具体表现为“我们是这样”或“我们不是这样”的正面或负面的认同。阿莱达·阿斯曼认为身份认同就是我们通过共同记忆和遗忘来定义自己。这个问题是“我是谁”的问题，更确切地说就是“我们是谁”的问题。与以知识为中心的历史学为基础的身份认同不同，通过记忆的身份认同在生活的每个瞬间都起着作用。另外，作用于身份认同的记忆既是集体共同的记忆，同时也是个人的记忆。⁵⁾

扬·阿斯曼所定义的交往记忆，是指对刚刚逝去的过去的回忆，是人们与同时代的人共同拥有的回忆。⁶⁾他认为：“这种记忆在历史演进中产生于集体之中，它随着时间而产生并消失，更确切地讲：是随着它的承载者而产生并消失。也就是说，当那些将它实体化地承载者死亡之后，它便让位给一种新的记忆。八十年是一个边界值，它的一半，即四十年，意味着一个重要门槛。”⁷⁾在此意义上，对于韩华来说1960年代似乎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韩华的韩国移居历史的开始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期，发展至1960年代，上一辈韩华带着上一辈韩华的记忆逐渐逝去，而在韩国出生的新一代韩华已长成青年。他们大多在台

2) 参考扬·阿斯曼著，金福寿·黄晓晨译，『文化记忆 - 早期高级文化中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p. 10。

3) 『文化记忆 - 早期高级文化中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pp. 28-29。

4) 『文化记忆 - 早期高级文化中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pp. 46-47。

5) 以上论述参考이중훈, 「문화적 기억의 특성들과 그 특성들의 상호작용 : 안 아스만과 알라이다 아스만의 논의를 중심으로」, 『인문콘텐츠』, 제61호, 2021, pp. 77-79。

6) 参考『文化记忆 - 早期高级文化中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p. 44。

7) 『文化记忆 - 早期高级文化中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p. 44。

湾或者韩国接受了高等教育，产生了与上一辈韩华不同的记忆；另外往返于韩台之间，或者说是生活在韩台夹缝中的韩华青年，开始集体性的以自身的阅历去重新审视韩华社会，结合自身的生活处境反思韩华文化，也是集体性自觉探索身份认同意识的开始。

各种文学作品都与记忆文化的过程联系在一起。这种关联多种多样，从象征形式的文学到集体记忆形成和记忆转移的过程中，文学扮演着积极的作用。文学世界的生成与集体记忆的象征性源泉紧密相连，与记忆文化的所有媒体一样，文学不仅触碰了这些现存的现状物，还会使它们在记忆文化实践中发生改变，以这样转移的形式，重新储存到集体记忆中。8) 华文杂志『韩华春秋』是月刊，1964年6月15日在首尔发行，自1964年6月至1966年4月共发行20期。这本杂志几乎是唯一一本没有附属于任何组织或机关，属于韩华自发创办的韩华华文杂志。它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便可以看作是韩华集体性自发性地从事华文创作的开端。9) 『韩华春秋』的文学世界，在那些象征性秩序已经传达特定回忆的文化背景下产生，这些文学作品使用集体记忆的这种“概念网”，将回忆的和忘却的事物联系起来。在这里个人的、集体的记忆通过一系列特殊的审美处理被再次建构。所有的文学记忆表现都具有反省性内涵，因此韩华读者又可以通过这些文学作品观察到自己和他人的记忆文化。10) 而与以机构化、系统化、经典化为基础的文学的记忆有所不同，以虚构为特征的文学作品所演示的回忆形式显然更加丰富，更具活力，从而也更具有选择性特征。11) 因此，本文主要选择以虚构为特征的“小说”这一文学体裁，通过1960年代连载在『韩华春秋』上的3部华文短篇小说作品「外人部队」、「烟台风云」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探讨韩华在韩国文化、中国(大陆)文化与台湾文化相互交融的独特文化语境下，关注过去或当下的哪些焦点；继而又是通过怎样的叙述策略，将这些直接或间接的经历，或是想象或虚构的事件加以象征和阐释，最终使其引起韩华社会的集体回忆；这些小说作品作为集体记忆的重要表达方式，在韩华集体寻求身份认同上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8) 以上论述参考안스가 닐링·로이 조머 퍼넬, 문화학연구회 옮김, 『문화이론과 문학연구』, 연세대학교 출판부, 2008, pp. 171-173.

9) 『韩华春秋』在创刊号的发刊辞中说：“韩华春秋不是阿谀党派的机关纸，更不是任何权势的应声虫。韩华春秋的生存，不是代表本社同仁的生存，而是三万华侨表现意志的生存意义。”虽然之前在一些华文报纸的副刊上也刊登过韩华的华文创作，但是因为这些华文报纸几乎都附属于韩国政府或民间组织，或是相关韩华机构，多少带有一些“机关报”的性质；另外，这些华文创作也是零散刊登，尚未形成集体性创作规模。

10) 参考『문화이론과 문학연구』, 연세대학교 출판부, 2008, p. 173.

11) 冯亚琳, 「文学与文化记忆的交会」, 『外国语文』, Vol. 33 No. 2, 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 2017, p. 48、54.

2. 作为文学媒介的小说

「外人部队」(1965. 1-9, 连载9期), 是作者夏侯辰为了纪念在韩战中英勇牺牲的韩华青年而作。故事讲述的是在1950年10月的北韩平壤, 12位韩华为保卫家园, 争取自由自发组成搜索队, 与北韩的内务属员斗智斗勇, 营救坎兴里看守所里关押的特殊户籍“犯人”; 参加牡丹台战役, 立下战功, 在牡丹台下与联军的正规军汇合, 受到韩国军队金少领的称赞。正当搜索队员完成任务, 准备“卸甲归田”之际, 收到韩国第一师团金上校请求协助参展的信件, 决定再次踏上征途的故事。

早在1951, 当得知年韩华义勇搜索队副队长姜惠霖烈士作战阵亡的消息时, 作者就决意“为这些英勇的斗士们立传”¹²⁾, 因为“觉得我们既然生活在这样一个战斗的时代中, 就应该为这个时代留下一页历史的副本。”可是“腹稿在脑海里酝酿了13年, 始终没敢下笔。”¹³⁾然而, 最终促使作者动笔的一个重要原因, 则是1964年12月12日姜烈士遗骨正式被安葬首尔市郊铜雀台韩国军公墓。不仅是因为这些韩华青年的英勇事迹在韩华社会已经家喻户晓, 更重要的是, 1951年为韩战而牺牲的韩华青年, 终于在13年后被安葬于韩国军公墓这一事实, 对于生活在韩国的韩华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始终以外国人身份生活在韩国社会的韩华, 他们其实与韩国人经历着共同的历史、共同的命运这一事实终于被承认。直到现在, 韩华社会每年5月都会在首尔国立显忠院为牺牲的韩华烈士举行追悼仪式。悼念亡者是一种典型的“对集体起到促成作用”的记忆, 一个集体在回忆中建立了与亡者的联系, 从而确认自己的认同。¹⁴⁾阿莱达·阿斯曼认为颂德、追悼、纪念碑等是文化记忆的代表性事例。这些以历史和记忆为基础的习惯, 构成了韩华社会集体的共享领域。文化记忆不能用明确的理论或客观事实来解释, 在这里沟通、共鸣、共享总是不断重复。从文化记忆以集体为单位发挥作用的角度来看, 文化记忆也具有政治性。¹⁵⁾文化语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作者“叙述什么回忆什么”, 作者又通过自己特殊的审美手法重新阐释与建构着集体记忆。

「烟台风云」(1965. 8-1966. 1, 连载5期)是一部“侠”、“情”兼备的武侠小说。小说时间设定在清末民初, 讲述的是主人公崔如宏由复仇者成长为革命军的故事。小说从在外跑船的崔如宏回到烟台, 来到熟悉却充满回忆的当舖前, 开始逐步交代他崎岖的身世, 进

12) 这里所说的包括副队长姜惠霖烈士在内的韩华义勇搜索队, 原本生活在北韩, 韩战爆发后自发组成搜索队与北韩军作战。韩战结束后, 搜索队员大部分随军移居到韩国(南韩)。

13) 参考夏侯辰, 「外人部队」, 『韩华春秋』, 第8期, 1965. 01. 15, p. 29。

14) 参考『文化记忆 - 早期高级文化中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 pp. 56-58。

15) 参考이중훈, 「문화적 기억의 특성들과 그 특성들의 상호작용 : 안 아스만과 알라이다 아스만의 논의를 중심으로」, 『인문콘텐츠』, 제61호, 2021, pp. 79-81。

而推动故事。位处于朝阳街的当铺，是母亲带着幼时的崔如宏含泪当掉手镯的所在，也是五年前认识红楼女子红云的地方。当时，崔如宏的父亲在出海捕鱼时被日本军舰抓走，母亲也因此忧愤交错、精神错乱，投海自尽。在经历十多年生活煎熬后，与红云的相遇为崔如宏带来新的幸福生活。然而，两人的命运是多舛的，除了崔如宏投入的革命事业外，在烟台横行霸道的程瞎子、胡大彪、李三等恶人角色，都为这两人的生活制造许多挫折与冲突。崔如宏后来与天地会成员一同在广州举事，并逐步北上在烟台掀起反对满清的革命。革命胜利了，但是红云却因为身体过于虚弱而离开人世。在革命过程中，小说也透过程瞎子与胡大彪的一场对峙，揭露崔如宏与两位恶人：李三、程瞎子的冤仇纠葛。更重要的是，崔如宏后来从李三口中得知本以为已经去世的父亲居然还活着。¹⁶⁾

故事发生的地点在中国烟台。90%以上的韩华都是山东出身，不管是从作者的角度还是从韩华读者的角度，烟台都是他们熟悉的地方，因此很容易使读者产生共鸣。从历史背景上来看，烟台对于韩华来说，是一个具有回忆性的地点：一个早期韩华的经济贸易重地，一个回不去了的故乡，一个只能向往和回忆的过去。¹⁷⁾「烟台风云」的作者长峰，祖籍是山东牟平县，也就是现在的烟台牟平区，因此从小就听到父亲和叔父，经常讲述有关烟台的故事。又长因怀念亲人及回不去的故乡，在朋友们的怂恿下，尝试写作小说。¹⁸⁾接连发生于1940-50年代的几场重大历史变革，使移居韩国的韩华无法再踏上回乡之路。1960年代的韩华，已被与故乡隔绝10余年，大多数第二代或第三代韩华甚至从来没有见过故乡的模样。从父辈口中听来的有关故乡的描述，使他们更加好奇，他们试图将这些故事拼凑连接起来，可似乎仍然拼不出一个大致的轮廓。为了化解上一辈韩华“实在”的乡愁，也为了化解新一代韩华“虚幻”的乡愁，「烟台风云」的作者在想象的世界里，虚构了一个故乡，虚构了一个发生在故乡的故事，却为韩华社会建构了一个回忆，一个集体的回忆。

如果说「烟台风云」创作于那虚幻的乡愁，那么「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1964.6-12, 连载6期)则创作于生活的真实。小说讲述了一位韩华青年留学台湾的经历，以及围绕这位青年周围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产生的一连串的矛盾：小说采用倒叙的方式，开篇讲述一位穷困潦倒的韩华青年锺辰为谋求生路，只身从釜山来到首尔。正当他彷徨无措时，幸好遇到初中同学黄秀民和宋强。通过交谈锺辰得知原来身在首尔的韩华青年也一样求职艰难。无宿可投的锺辰只好暂时住在宋强家，靠一份家教维持生计。一天一辆时髦的轿车从他身边飞驰而过，从车上走下来的女人迫使他回想起所有的往事。这个女人是他的初中同学赵

16) 更详细内容参考梁楠·翁智琦，「冷战现代性：1960年代韩国华人华文小说研究」，《中國學》，第75輯，大韩中国学会，2021，p. 104。

17) 参考梁楠，《韩国华人华文文学论》，秀威出版社，2020，p. 92。

18) 参考笔者采访『韩华春秋』主编时的采访记录（2021.03.01.）。

萍萍，他们的再次相见是锺辰高二那年暑假在台湾的基隆码头。因为当时留学台湾的韩华青年外汇问题得不到解决，只好利用往返韩台两地贩卖商品的办法赚取学费，赵萍萍也是其中一位。赵萍萍曾向锺辰表白心意，锺辰却因两人家庭背景相差悬殊而有意躲避。感情上的失落加上联考名落孙山，使锺辰变得郁郁寡欢。走投无路的锺辰无奈打算向人借钱跑一趟单帮。正当他满怀希望地踏上基隆码头时，却再次遇到了赵萍萍。心里又在复炽冲动的锺辰为给赵萍萍解围挺身而出，却因为赵萍萍的违禁品被扣留在海关。最后他再没能取回自己的行李，只得知赵萍萍已经跟她的表哥订婚，她是不再回台湾，而自己是再也不能回台湾，他的一切损失一光。¹⁹⁾

对于韩华来说，关于就学问题，一般在升入大学之前可以有三个选择：其一是升入韩国的学校，其二是进入韩华学校，其三是赴台湾留学。1960年代，因为台湾政府为韩华提供了诸多优惠政策，所以当时选择赴台留学的韩华为数众多。这一事实给韩华带来了希望，但同时也带来了隐患。大韩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自成立政府后，移居韩国的华人的地位、身份等问题，都变得暧昧模糊。他们本以为来到国籍所在地台湾就能找到希望，可现实却并非如此，想象与现实格格不入。他们是生活在韩国的祖籍是中国大陆的台湾人，但似乎又都不是。作者张岚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蓝本，“我首先对自己的要求，是绝对忠实的写”，给韩华读者建构了一个有关韩华青年台湾留学经历的回忆。“我不强调能写出一篇什么感人肺腑的东西，我只求读的人对它有一种亲切感”，作者希望读者在此“可以找到自己的内心，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现实问题，以及自己的将来。”²⁰⁾

3. 韩华华文小说中记忆叙事的生产

叙述性是文学与记忆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交会点，在文学作品中我们更多地观察到有意为之地对叙述策略的选择。²¹⁾阿斯特莉特·埃尔用“虚构记忆叙事的生产”来指称这一特殊的文学表现形式。埃尔认为文化语境对“叙述什么和回忆什么”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也就是说，叙述主体的选择对文学回忆具有结构意义。²²⁾1960年代出现的3部韩华华文短篇小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外人部队」和「烟台风云」在当时社会文化语境下的影

19) 更详细论述请参考梁楠，《韩国华人华文文学论》，秀威出版社，2020，pp. 93-98。

20) 张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韩华春秋》，第1期，1964.06.15，p. 28。

21) 冯亚琳，「文学与文化记忆的交会」，《外国语文》，Vol. 33 No. 2，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2017，p. 52。

22) 阿斯特莉特·埃尔著，吕欣译，「文学作为集体记忆的媒体」，《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冯亚琳，「文学与文化记忆的交会」，《外国语文》，Vol. 33 No. 2，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2017，p. 52。

响下，各自回忆着不同的事件与经历，又分别选择了不同的叙述策略来生产回忆。

作者作为“全知叙述主体”，充当的不仅是虚构故事中的人物，并且概览时空关系，知晓故事中人物的一切，包括他们的行为方式和行为意图，不仅如此，他还具有道德和价值评判的权利。²³⁾「外人部队」的作者，之所以选择小说这种体裁，是因为考虑到创作当时搜索队员的家族多留在平壤，为顾虑他们的安全。另外，小说体较为自由，有些情节为适应结构上的调顺需要加以演义。²⁴⁾在这里就需要我们关注作者使用何种叙述策略加以“演义”这段记忆。

作者对小说人物的描写具有鲜明的道德与价值评判标准。也就是说，小说是战争体裁，因此作者对“敌”与“我”的善恶对比色彩相当鲜明。比如：作者在描写韩华搜索队员及家属时，总会表现其英勇、机智、沉着、稳定的一面；相反在刻画北韩内务属员时则表现得粗鲁、凶狠、好色与无能。小说中，首先登场的是韩华搜索队的陈善宽，“一个风雪交加的寒夜，在西平壤市郊一所华侨经营的菜园里，陈善宽正在忙着记录美国之音的中国语新闻广播。”突然听到急躁而粗鲁的敲门声时，作者是这样描写老陈的：

收听中的老陈，急忙从被窝中拿出收音机，把指针扭到平壤放送台的位置上，熟练地打开收音机后壁板，拔下两个电球，连同记录藏到屋角一颗挖去结心的白菜里。²⁵⁾

紧接着，作者又是这样描写北韩的内务属员：

随着刺骨的风雪，凶纠纠的冲进两个持着枪的“内务属员”。还没等老陈说完，脸上早已重重地挨了干部模样属员的一记巴掌。“这几天各处发现的油印反动文书，是你们这些狗东西发出去的，果然不错。”²⁶⁾

当听完老陈机智的辩解后，内务属员的脸已“变成了猪肝色，忽地从腰间抽出麻花绳子，满头没脸的狠狠地往老陈身上抽下。”内务属员进到屋内，只有一老妇人及一个二十余岁的少女。这两位搜索队员家属“脸上的表情都很镇静”，而内务属员却是“色迷迷地朝着少女”问话。²⁷⁾

不仅是老陈，韩华搜索队的所有成员都是一样的沉着勇猛，豪情万丈。当队长刘之柚告诉大家：“这是我们为自由而献身的大好机会，各位有身后事情，可留话与善宽兄分别

23) 冯亚琳，「文学与文化记忆的交会」，《外国语文》，Vol. 33 No. 2，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2017，p. 52。

24) 夏侯辰，「外人部队」，《韩华春秋》，第8期，1965. 01. 15，p. 29。

25) 夏侯辰，「外人部队」，《韩华春秋》，第8期，1965. 01. 15，p. 30。

26) 夏侯辰，「外人部队」，《韩华春秋》，第8期，1965. 01. 15，p. 30。

27) 以上引文出自夏侯辰，「外人部队」，《韩华春秋》，第8期，1965. 01. 15，p. 30。

传达”时，队员们各自交待后事，“好像平常托人到市场捎一件东西一样，毫无犹疑”；二十五岁的副队长姜惠霖搬来一坛白干酒，大家滴血酒中，一同取杯豪饮。²⁸⁾在这样的豪壮面前，对手那架在黑影中有如“上古喷火的怪兽”般，吐着火舌的坦克，也不得不“像一个病危的老人，轰的一声，吐出了它最后一口气，一阵火焰之后，一切都归于寂静”。²⁹⁾作者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道德与价值判断，恐怕与作者所接受的台湾教育，以及当时韩国社会的舆论宣传与社会氛围影响——也就是当时的文化语境是分不开的。由于全知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一种说教者和被教化者之间的关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担当的是文化记忆传达者的角色。³⁰⁾因此，作者的这种道德与价值判断也将不断影响读者的记忆，读者的判断。

「烟台风云」的作者作为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不仅概览全局，知晓故事中人物一切行为方式和意图，并且在人物塑造中嵌入了自己对于道德与价值的阐释。在这部小说中“铁胳膊李三”这个角色被作者塑造的较为立体而饱满，因为他不是纯粹善恶的代表，他比同样是“黑道”人物：残忍好色的“程瞎子”、奸诈狡猾的“胡大彪”，多了一点点“义”字；但是他利用一身好武功只为独霸一方，没有用在“正道上”。因此，通过一段作者对李三的细节描写，我们就可以体会出作者对其既非钦佩也非厌恶的暧昧态度：

忽听“吱”了一声，一只老鼠在嚼食落在地下的花生米，被李三脚碰到，惊叫地逃窜，李三顺脚踩下，两指一弹，烟签飞驰而出插在老鼠身上，老鼠爬了几步不动了。³¹⁾

作者接着写道：“这时门口站着一个人，看到李三这轻描淡写的动作，举手之间扎死一只老鼠，心中不免暗暗钦佩”³²⁾，似乎只有像胡大彪这样的市井无赖才会“钦佩”李三这身功夫。

小说中值得关注的另外一个人物是海参崴华人第一富商姚富贵，他被作者塑造成为正义的化身，是兼具财富、武艺、行侠仗义德行于一身的人物。作者对他的外貌描写简练而传神：“顷刻，从内屋走出来一位身穿毡袍，头戴皮帽，天庭饱满，目光炯炯，莫约五十岁的老人。”³³⁾面对这样的人物，就连横行烟台的铁胳膊李三也不得不谨慎三分。作者这样描写道：“这天铁胳膊李三穿了一身紧身靠，腰中捆着七节鞭，靴里暗插腿叉，外面又套上一件崭新的罩袍”，简直是万般准备于一身。与此相比，姚大爷显得异常“沉

28) 引文出自夏侯辰，「外人部队」，『韩华春秋』，第8期，1965.01.15，p.31。

29) 夏侯辰，「外人部队」，『韩华春秋』，第11期，1965.04.15，p.29。

30) 冯亚琳，「文学与文化记忆的交会」，『外国语』，Vol.33 No.2，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2017，p.52。

31) 长峰，「烟台风云」，『韩华春秋』，第15期，1965.08.15，p.31。

32) 长峰，「烟台风云」，『韩华春秋』，第15期，1965.08.15，p.31。

33) 长峰，「烟台风云」，『韩华春秋』，第18期，1965.12.15，p.27。

着”，寒暄几语，稳住李三，接着：

急步走到墙边，从镜框后右手摸出一物藏在怀里，同时向窗帘一挑，掉出一把亮铮铮的铜叉接在手里，这时眼睛逐渐变红，脸色也同时发青，突然一个箭步，嗖的一声从另一侧门窜出外厅，在李三背后，将钢叉架在李三脖子上。³⁴⁾

“万分惊险地交手”，只发生在“一两秒钟”之间，等回过神来，李三脖子上已经“血流潺潺，七节钢鞭牢牢缠住了两只手臂”³⁵⁾，此时的姚富贵左手一把雪亮的铜叉，右手握着一把来福手枪。

“钢鞭”与“手枪”，在这里分别是“旧时代”与“新时代”的隐喻，在“新”与“旧”的第一次较量之下，“旧”已经是遍体鳞伤。而在小说的末尾，李三最终在烟台西门外的西沙汪被执行枪决，这一次，只在“‘砰’‘砰’的几声”中，这纵横烟台二十年的硬汉，也软了下来，倒在血泊里”³⁶⁾，在新时代面前，旧时代显得如此软弱无力，不堪一击。

相比之下，第一人称的叙述主体则通过叙述个体的经历，他的生活经验及其主观价值判断被演示为“叙述知识”，从而进入集体记忆的框架之中。³⁷⁾巴斯勒和比尔克也认为，对于记忆演示来说，最典型的叙述场景是第一人称叙事。一方面，“过去成了被回忆的过去，角色明显成了被回忆的角色，而故事则拥有了回顾性的意义”；另一方面，“回忆对于回忆者而言，是一种精神旅行，是再次经历发生在过去的事情”。³⁸⁾「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是一部典型的第一人称叙事小说。作为人物叙述主体的作者，希望读者可以通过自己的回忆叙事，找到各自的内心，各自的生活，各自的现实问题，以及各自的将来，这正体现出叙述主体期待与读者之间形成这种号召与响应的关系。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部小说，不像前两部小说那样具有鲜明的“善与恶”或是“新与旧”的对比，而是通过历时与共时性的对照手法，制造了充满质疑与思考的氛围。历时性的对照，首先体现在作者通过设置“被叙述者—我”与上一代韩华的对话，揭示父辈与青年一代世代间在思想上的差异。“被叙述者”好友宋强的父亲，将生活的不如意归因于国家的不够强盛，而“我”则认为是韩华“过去知识的低落”³⁹⁾。接着作者又给

34) 长峰，「烟台风云」，《韩华春秋》，第18期，1965.12.15，p.27。

35) 长峰，「烟台风云」，《韩华春秋》，第18期，1965.12.15，p.27。

36) 长峰，「烟台风云」，《韩华春秋》，第19期，1966.01.15，p.27。

37) 冯亚琳，「文学与文化记忆的交会」，《外国语文》，Vol.33 No.2，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2017，p.53。

38) 参考冯亚琳，「文学与文化记忆的交会」，《外国语文》，Vol.33 No.2，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2017，pp.52-53。引文也转引自此参考资料。

39) 张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韩华春秋》，第4期，1964.09.15，p31。

“我”与下一代韩华少年创造了一次对话的机会。面对那个不能下决心学英语和韩语，每天都发愁，却不知道愁的是什么样的孩子，“我”觉得：

我了解他空虚的心情，不过我也无法为他解答，我自己又何尝不是空虚的？每天我失神街头，有时自己要往哪里去都不知道，我又从哪里能得到答案？

日复一日的过去，我感到精神上的疲倦是无休止的，我愈来愈想逃避，我要想逃避的究竟是什么？我也无法知道。⁴⁰⁾

“我”因为认识到上一代韩华是由于缺乏知识而生活得辛苦艰难，从而认真读书学习更多知识，但是结果却发现，他仍然无法找到出路，因此也无法给予面前无助的孩子任何有帮助的建议。共时性的对照体现在，与“我”同时代的韩华青年间生活样相的对照。小说中登场的韩华青年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未在韩国的学校接受过教育的韩华，如“我”、宋强、黄秀民等；一类是在韩国的学校接受过教育的韩华，如赵萍萍、张正海等。在“我”眼中：两位好友均像自己一样家境贫寒，终日为求职而苦；而赵萍萍“由于念的韩国高中，占了一年的便宜，被保送进入台大”，张正海认识韩国海关人员，可以办到他能力不及的事情。小说没有明确表现他们后来的情况，只通过交待赵萍萍嫁给了张正海，开着豪华跑车飞驰过“我”的身边的细节来显示他们生活上的富足。

整部小说的叙述氛围都非常的压抑，一种深陷海底，无论怎样挣扎都无法到达登岸口般，令人窒息的压抑。相对于被叙述者“我”，叙述者“我”更具信息和心理上的优势，他会对其后的感知和行为方式进行相应的评论和评价。⁴¹⁾作者作为叙述者的“我”，通过这部小说想要反思的最核心主题，恐怕就是“出路”的问题。与全知叙述文本不同之处还在于，人物叙述主体与读者之间不再是说教关系，而是号召与响应的关系。⁴²⁾作者想通过对自己回忆的演示，将读者与被回忆者“我”一起，拉回到过往的经验中，与读者一起去反思、去重新审视：新一代韩华青年，是否仍然应该固守上一代韩华的那种“学而从夷谤之谓忘本、奴才、不爱国”⁴³⁾的旧观念，在反思中寻找属于他们的“突破口”。

40) 张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韩华春秋』，第4期，1964.09.15，p.31。

41) 冯亚琳，「文学与文化记忆的交会」，『外国语文』，Vol. 33 No. 2，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2017，p. 53。

42) 冯亚琳，「文学与文化记忆的交会」，『外国语文』，Vol. 33 No. 2，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2017，p. 53。

43) 心芸，「苦闷·彷徨·迷茫——“学士”何去何从？」，『韩华春秋』，第6期，1964.01.15，p. 14。

4. 韩华华文小说中回忆性的空间描写

文学中的空间描写与现实世界处于一种模仿关系之中，在文学作品中，空间描写对于回忆的演示同样具有重要性，“时间空间化”和“空间时间化”就是一种建构“回忆性”空间的描写功能。⁴⁴⁾所谓的“时间空间化”和“空间时间化”是建立在米歇尔·巴赫金的“时间地理”，这一指向空间和时间的变换关系的概念之上：

描写某人来到一个他以前曾经待过的地方，然后回忆起了当时的情境。这时，“空间体验”就转化成了时间体验。此时，空间充当的是“时间的存储器”，它在回忆者内心唤起的是一种熟悉感；与“时间储存器”的功能相反的是，空间在个体的回忆中更指向变化：这种变化有两种方式：一方面，地点自身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这一点更具决定性——通过空间的连续性，感知空间的主体也在发展。⁴⁵⁾

文学的基础是生产和阐释现实的创造性过程，通过筛选和重组实际的、想象的、回忆的、遗忘的等处理过程，创造出特定的现实版本和过去版本，通过叙事模式来处理时间与空间经验。⁴⁶⁾韩华作者以小说这种文学形式，通过各自不同的叙述策略来演示各自的记忆。我们大致可以从三个层次来分析韩华作者的记忆通过文学演示为我们展现的“空间”的象征意义。

首先，韩华作者为我们展现了具有“故乡”隐喻意义的“空间”。因为回忆也植根于被唤醒的空间，就像房屋之于家庭、村落山谷之于那里的农民、城市之于它的市民、某个地区之于该地区的居民一样，它们是回忆的空间框架，即使当它们或者说尤其是当它们不在场时，便会被当作“故乡”在回忆里扎根。⁴⁷⁾「烟台风云」的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的一个古老的港口城市。这里的时间和空间，对于韩华来说，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它象征着韩华韩国移居的开端。在故事发生的那个年代里，通过港口这个便利条件，人们可以自由往返于两个区域之间。此时的空间就像一个“时间存储器”，在回忆者的内心唤起熟悉的记忆。小说开篇，就建构了一个想象的空间，这个空间对于韩华来说，便具有了“故乡”的隐喻意义：

44) 『文化记忆 - 早期高级文化中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 pp. 31-32; 冯亚琳, 「文学与文化记忆的交会」, 『外国语文』, p. 53.

45) 转引自冯亚琳, 「文学与文化记忆的交会」, 『外国语文』, pp. 50-53.

46) 参考안스가 닐링·로이 조머 퍼넴, 문화학연구회 옮김, 『문화이론과 문학연구』, 연세대학교 출판부, 2008, p. 174.

47) 『文化记忆 - 早期高级文化中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 p. 31.

夕阳的彩霞映在海面一片火红，晚弦的浪潮一波一波的击着朽枯不堪的码头，远眺是芝罘北岛和崆峒岛在遥遥相对，岛地几叶小帆正在归航；一切的景象衬出是一幅古老港口的图画。在这古老的港口里，几年前发生过一次传奇性的美景；那就是“海市蜃楼”，这有名的福山县八大景之一——“烟台海市”，直到如今人们的心中还悠悠的记忆着那次的情况：当时这码头上站了无数的人都眺望海面上空，从“海市”的景象中只见赶集的人来来往往，热闹得与真实一般，有人说那是“八角大集”；有人讲在道光年间也有过一次，也有人说自从甲午那年闹日本鬼子后再也不会看到“海市”了……⁴⁸⁾

那遥遥相对的芝罘北岛和崆峒岛，岛地正在归航的几叶小帆，悠悠留在人们记忆中的“烟台海市”，热闹非凡的“八角大集”，再加上小说中登场的各个带有烟台韵味的地点、场所，比如：朝阳街的“协成当铺”、南大街的青楼、烟台城西的百夜市场、市场东端的西门楼牌等等，这一切都使作者建构的空间显得如此真实，仿佛带着读者的回忆一起回到了故乡。但是这个空间又像“海市蜃楼”一般虚幻飘渺。过去在记忆中不能保留其本来面目，持续向前的当下生产出不断变化的参照框架，过去在此框架中被不断重新组织。⁴⁹⁾ 新一代韩华把从父辈那里听来的记忆，赋予了自己的另一种阐释。这个空间亦真亦幻，亦幻奕真。父辈的记忆影响着作者的记忆阐释，这一阐释又以文学演示的象征形式，影响着读者的阐释与回忆。群体与空间在象征意义的层面上构成了一个有机共同体，即使此群体脱离了它原有的空间，也会通过对其神圣地点在象征意义上的重建来坚守这个共同体。⁵⁰⁾

其次，韩华作者为我们展现的“空间”具有“跨”区域的象征意义，而这种跨区域意义又是通过小说中“码头”这一意象来完成的。对于韩华来说，“码头”具有连结两个地域的作用。「烟台风云」中登场的“码头”，衔接的是烟台和海参崴，人们可以坐船，自由往来于这两个区域。海参崴作为一个暂时避难之所而登场，它的景象是如此被描写的：

不多年前还是大清国的地方，而在一次条约中割给了俄罗斯，所以市街上一切还是中国人的景象，布庄茶楼，担夫小贩无不是汉人和满人所做的，偶尔看到几个俄国巡捕在街上巡逻，或是一辆大马车飞驰而过，上面坐了几个老毛子和洋婆子。⁵¹⁾

作者感慨世事无常，人们无力搏击命运的无奈。也许是韩华当下的遭遇与处境，使作者对海参崴这个城市具有特殊关怀。不多年前，韩华还可以自由往返于故乡与移居地之间，但是由于战争与世界局势的变化，他们再也回不去故乡，成为留在异乡的异邦人。这

48) 长峰，「烟台风云」，『韩华春秋』，第15期，1965. 08. 15，p. 29。

49) 『文化记忆 - 早期高级文化中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p. 35。

50) 『文化记忆 - 早期高级文化中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p. 32。

51) 长峰，「烟台风云」，『韩华春秋』，第18期，1965. 12. 15，p. 27。

似乎与由于割地，而被迫成为俄罗斯异邦人的群体具有“同病相怜”之感。

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中也出现了“码头”，这里的“码头”不像「烟台风云」中那样古老而虚幻，而是众多韩华实实在在的经验之地。这里的“码头”连结着韩国与台湾这两个对于韩华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空间”。各种类型的集体都倾向于将回忆空间化。任何一个群体，如果它想作为群体稳定下来，都必须想方设法为自己创造一些这样的地点，并对其加以保护，因为这些地点不仅为群体成员间的各种交流提供场所，而且是他们身份与认同的象征，是他们回忆的线索。⁵²⁾韩国对于韩华来说具有生存空间的意义，台湾对于韩华来说具有法律上归属空间的意义。韩国与台湾这两个场所，同时为韩华提供着交流的场所、身份认同的象征、回忆的线索。

最后，韩华作者为我们展示的“空间”被无限放大，甚至被扩展到整个人类空间。「外人部队」把读者带回到一九五零年十月的北韩平壤这个“北风催雪，战云密密，到处是一片联军轰炸后的残垣断壁”的空间。这是一部回忆战争的小说，作者有明确的建立在自己道德价值判断基础上的“敌”“我”之分，但是这种判断同时又具有超越国家民族界限的意义，具有全人类的意识。也就是说，在这里，北韩平壤只作为战斗发生的空间登场，而战争本身，却是全人类共同经历的痛苦与灾难。在小说中，似乎没有“胜者”也没有“喜悦”：当“整个北韩都暴露于联军优势的空中爆击下”时，进入作者眼帘的景象是“市街上的一片凄凉”，进入作者脑海的忧虑是“在立体战术下，缩短了战争的距离”。只有得知“善良的北韩百姓多半下乡避难”⁵³⁾时，才让作者感到些许的安慰。“牡丹台是西平壤近郊的一座小山，山顶有一古式凉亭，叫做牡丹亭，登临其上，整个平壤市及大同江铁桥进入眼底”，但是“自韩战爆发，这里就被划为军事要地”⁵⁴⁾这件事不禁让作者感慨与惋惜。参加这场战争的——也许说成被“卷入”这场战争才更为准确——除了韩华搜索队，还有三个被韩华搜索队俘获的日本炮手（被俘获后一起协同搜索队作战）。作者同情这三个炮手，觉得他们“默默的毫无表情地坐在旁边，也许他们已对战争发生厌倦，从他们不可知的未来，想到他们久别的故乡”⁵⁵⁾。当听到搜索队要再次参战的消息，“许多家眷忍不住这生离死别的场面，纷纷的掏手巾泪”⁵⁶⁾。作者不由感叹：“人类自认为万灵，但自有史以来，却用他们的智慧，去制造战争，最终又被战争支配了自己的命运”⁵⁷⁾。

52) 『文化记忆 - 早期高级文化中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 p. 31-32.

53) 以上引文出自夏侯辰, 「外人部队」, 『韩华春秋』, 第8期, 1965. 01. 15, p. 29.

54) 以上引文出自夏侯辰, 「外人部队」, 『韩华春秋』, 第10期, 1965. 03. 15, p. 29.

55) 夏侯辰, 「外人部队」, 『韩华春秋』, 第11期, 1965. 04. 15, p. 30.

56) 夏侯辰, 「外人部队」, 『韩华春秋』, 第16期, 1965. 09. 15, p. 27.

57) 夏侯辰, 「外人部队」, 『韩华春秋』, 第11期, 1965. 04. 15, p. 30.

5. 结论：记忆、身份认同与文学的三维交互

文学创作是一个主动阐释与建构的过程。利柯就曾提出“模仿的圆圈”理论，认为文学作品创作出现实需要经过一个动态的转换过程：文学作品首先与文本以外的过去的世界产生联系（模仿第一步），然后对其进行“艺术造型”，使之成为虚构的形象（模仿第二步），最后通过读者对其进行“再塑形”（模仿第三步）。借助利柯的理论，可以区分文学与记忆之间的关系的各种不同的层面：第一，文学作品跟外界的记忆有关；第二，它通过虚构媒介展现外界记忆的内容和运作方式；第三，它可影响个体记忆和记忆文化。⁵⁸⁾ 诺伊曼借用了利柯的模仿圆圈理论来探讨记忆、身份认同和文学之间的三维交互关系模式。首先，文学指涉了那些过去的、非文学的历史事实，这些历史事实预设了文学的框架。其次，文学作品能够演示记忆与身份认同。最后，对记忆和身份认同的文学演示又能够反过来影响非文学的现实。⁵⁹⁾ 韩华的华文小说创作同样经历了这样一种主动地阐释与建构的过程。

本文所探讨的3部小说作品之所以同时出现在1960年代，这与当时韩华的记忆语境有着直接的关系：曾经参与韩战的韩华搜索队的队长及参谋长等多人，在韩战停战后，一直跟韩华们生活在一起，他们的故事家喻户晓；每年重复举行的韩战牺牲韩华烈士的追悼仪式；上一代韩华对遥远故乡的依稀回忆，以及第二代韩华从上一代口中听来的有关故乡的片段想象；第二代韩华留学台湾的亲身经历等等，都在影响着作者的叙述与回忆。这些记忆经过作者的阐释，各自通过不同叙述策略的文学演示被重新建构。每个在虚构媒介中的生活细节，都可以解读为文化记忆的重要元素。每个虚构事件，一旦它被换到一个虚构文本的叙述结构中，它就成为了生活的暗示。⁶⁰⁾ 作者们或是将亲身体验转化为文化的意义世界；或是通过经验来丰富文化记忆。⁶¹⁾ 「外人部队」这个故事，曾两度被改编成电影剧本，可惜都没能拍成电影。当年韩华远离故乡，被隔绝50年，小说「烟台风云」曾慰藉许多韩华的乡愁。⁶²⁾ 作者对记忆和身份认同的文学演示又在反作用于韩华社会集体的文化记忆与认同。

为了治愈，为了推卸责任，为了辩解，我们总是诉诸记忆。记忆成为形成个人和集体

58) 以上有关利柯的论述参考阿斯特莉特·埃尔、安斯加尔·纽宁著，冉媛译，「文学研究的记忆纲领：概述」，《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p. 222。

59) 以上有关诺伊曼的论述参考刘海婷，「记忆、身份认同和文学演示」，《外国语文》Vol. 33 No. 2，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2017，p. 59。

60) 参考阿斯特莉特·埃尔著，吕欣译，「文学作为集体记忆的媒体」，《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p. 245。

61) 「文学作为集体记忆的媒体」，《文化记忆理论读本》，p. 245。

62) 参考笔者采访『韩华春秋』主编时的采访记录（2021. 03. 01.）。

认同的本质要素，不仅是认同，在矛盾中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场。⁶³⁾生活在韩国社会的第二代韩华感到，如果继续固执于韩华社会传统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就会四处碰壁，举步维艰。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第二代韩华已经成为了一个身份极为特殊的群体，如果想解释他们的身份，似乎需要多重的修饰词：他们是中国大陆出身，具有台湾国籍，长期生活在韩国的一个群体。就是因为这样特殊的身份，使得他们的集体记忆也呈现出多重样相，包括对“故乡”的记忆，对台湾留学生活的记忆，对在韩国现实生活的记忆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1960年代可以说是第二代韩华集体反思现实困境、集体寻找身份认同、集体思考未来出路的年代。第二代韩华作者通过自己的文学策略，颠覆性地解构了既有的对于“故乡”的记忆叙事，而是通过建构一个“海市蜃楼”般虚幻的“故乡”空间，并且通过“港口”、“码头”的象征意义肯定性地加强了这个空间的“跨”的意义。同时也通过塑造一群“身份特殊”的韩华搜索队群像，向传统的建立在国家民族基础上的身份定位模式提出了质疑与挑战。

文学作品作为被重组的各种话语的集合体，不仅能够表达社会文化语境中的记忆话语，还能试验性地让各种不同的话语进行对话，从而让这些话语组合成新的记忆与身份认同关联。⁶⁴⁾我们可以试想，这3部小说分别代表着3种不同话语的集合体，它们不仅表达社会文化语境中的记忆话语，而且这3种话语也在不断进行对话。如果说「烟台风云」中主人公崔如宏的红颜知己红云代表着旧有的“传统思想”，而并不知身在何方的父亲代表着新的未来，那么在“新”与“旧”的对比中，红云的死去，以及崔如宏继续寻父的决心，则暗示着一种对传统韩华身份认同的反思。「外人部队」则超越国族界限，将视野放远全人类。也许只有采取这样的叙述策略，才可以慰藉由于“特殊身份”而被包括在外的，韩华社会的尴尬心境。「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不仅通过亲身经历这种有意义的特殊经验和可靠性来影响韩华集体的日常性，并且使读者有可能参与到一个对记忆文化有距离的观察中。⁶⁵⁾叙述者以及被叙述者话语中的记忆隐喻和记忆反思也将不断影响着读者，引发读者对在地化需求的思考。

韩华华文文学作为媒介，通过对记忆的演示，尝试让各种话语进行对话，在不断对话中，构建了新的韩华集体记忆，这些新的记忆又继续影响着韩华对传统身份认同的反思，使韩华的身份认同呈现多重性与流动性的特征。

63) 阿莱达·阿斯曼的观点转引自이종훈, 「문화적 기억의 특성들과 그 특성들의 상호작용 : 안 아스만과 알라이다 아스만의 논의를 중심으로」, 『인문콘텐츠』제61호, 2021, p. 79.

64) 刘海婷, 「记忆、身份认同和文学演示」, 『外国语文』Vol. 33 No. 2, 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 2017, p. 59.

65) 参考阿斯特莉特·埃尔著, 吕欣译, 「文学作为集体记忆的媒体」, 『文化记忆理论读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p. 245.

【参考文献】

<单行本>

안스가 다퉈 · 로이 조머 펴냄, 문화학연구회 옮김, 『문화이론과 문학연구』, 연세대학교 출판부, 2008.

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 主编, 『文化记忆理论读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梁 楠, 『韩国华人华文文学论』, 秀威出版社, 2020.

扬·阿斯曼 著, 金福寿·黄晓晨 译, 『文化记忆 - 早期高级文化中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论文>

이종훈, 「문화적 기억의 특성들과 그 특성들의 상호작용 : 안 아스만과 알라이다 아스만의 논의를 중심으로」, 『인문콘텐츠』, 제61호, 2021.

阿斯特莉特·埃尔、安斯加尔·纽宁 著, 冉媛 译, 「文学研究的记忆纲领: 概述」, 『文化记忆理论读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阿斯特莉特·埃尔 著, 吕欣 译, 「文学作为集体记忆的媒体」, 『文化记忆理论读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冯亚琳, 「文学与文化记忆的交会」, 『外国语文』, Vol. 33 No. 2, 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 2017.

梁 楠·翁智琦, 「冷战现代性: 1960年代韩国华人华文小说研究」, 『中國學』, 第75輯, 大韩中国学会, 2021.

刘海婷, 「记忆、身份认同和文学演示」, 『外国语文』, Vol. 33 No. 2, 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 2017.

<其他资料>

长 峰, 「烟台风云」, 『韩华春秋』, 第15期, 1965. 08. 15. -1966. 01. 15.

『韩华春秋』主编的采访记录, 2021. 03. 01.

夏侯辰, 「外人部队」, 『韩华春秋』, 第8期, 1965. 01. 15. -1965. 09. 15.

张 岚,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韩华春秋』, 1964. 06. 15. -1964. 12. 15.

【논문초록】

키워드 Key Words	국문	기억, 집단기억, 문화기억, 문학 시연, 정체성				
	영문	Memory, Collective memory, Cultural memory, Literary demonstration, Identity				
<p>A Literary Demonstration of Memory and Identity</p> <p style="text-align: right;">Liang Nan</p> <p>The first thing that the word "memory" brings to mind is a kind of pure, internal phenomenon of the human body. However, memory is not something that can only be explained by the body's autonomous ability or control system, but is rather a more external issue. Jan Assmann considered that while it was the individual who had the memory, this memory wa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ociety. Memories exist and persist in interaction. People's memories contain not only the content exchanged during interactions, but also what is placed in the frame of collective memory. "Cultural memory" is a term increasingly used in literary studies. This paper selects the literary genre of novels characterized by fiction storytelling, elaborating on how the overseas Chinese writers revealed cultural elements in collective memory through three short Chinese literary stories serialized in the 1960s. It also shows the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cultural element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how these novels positively contributed to the recolle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population, by using collective memory as the core transmission method.</p>						
저 자	양난 / 梁楠 / Liang Nan					
논문작성일	투 고 일	2021.11.20.	심 사 일	2021.11.29.	게재확정일	2021.12.18.